

格勒
著

藏族早期

历史与文化



商務印書館

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

格 勒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格勒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442-1

I. 藏… II. 格… III. ①藏族—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 ②藏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39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

格 勒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442-1/K·845

2006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3 1/4

定价: 44.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孕育藏族及其古代文化的摇篮	16
第一节 藏族地区的三大自然区域及其环境特点	16
第二节 藏族传统的三大历史地理区域	22
第三节 卫藏——孕育藏族及其古代文化的摇篮	27
第二章 藏族及其古代文化的来源	38
第一节 远古的西藏高原是否有人类居住?	38
第二节 藏族的体质特征及种族来源	45
第三节 藏族源于“印度”和“发羌”?	56
第四节 藏族源于三大原始民族系统的融合	76
第三章 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	134
第一节 藏族的氏族组织	135
第二节 古代藏族社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	141
第三节 藏族文献记载的第一个部落联盟酋长聂赤赞普	143
第四章 氏羌南迁及其与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系	149
第一节 氏羌和氏羌民族系统	149
第二节 氏羌文化的原始中心区	154
第三节 氏羌东迁与汉化	159
第四节 氏羌原始文化南移	161
第五节 氏羌南迁与石棺葬文化	170
第六节 氏羌南迁与藏族及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系	200
第七节 小结	237

第五章 古代藏族与氐羌的融合及藏族各支系的形成·····	249
第一节 古代藏族与苏毗、羊同的融合·····	249
第二节 古代藏族与白兰羌的融合及藏族“白岭国”·····	255
第三节 古代藏族与党项羌的融合及“木雅”藏族的形成·····	266
第四节 古代藏族与氐族、宕昌羌、邓至羌的融合及迭部、 舟曲、白马等藏族的形成·····	289
第五节 古代藏族与西山诸羌的融合及嘉戎藏族的形成·····	307
第六节 小结·····	334
第六章 古代藏族与我国北方胡系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336
第一节 藏语对北方胡系统民族的泛称·····	336
第二节 藏北高原的“霍尔巴”·····	341
第三节 古代藏族与吐谷浑的关系·····	347
第四节 经过青藏高原到云南的北方“高鼻深目”人·····	351
第五节 古代藏族与回鹘的关系·····	355
第六节 古代藏族与突厥的关系·····	359
第七节 古代藏族与于阗的关系·····	362
第七章 古代藏族与伊朗、勃律、克什米尔等的文化交流·····	367
第一节 古代藏族与伊朗·····	367
第二节 古代藏族与勃律·····	376
第三节 古代藏族与“悉立国”·····	377
第四节 古代藏族与克什米尔·····	378
第五节 小结·····	381
第八章 古代藏族的共同特征·····	383
第一节 语言文字·····	383
第二节 地域·····	388
第三节 经济生活·····	391
第四节 心理素质·····	402

第九章 本教·····	410
第一节 本教的两种形态·····	410
第二节 本教的神·····	423
第三节 本教的巫师及其巫术活动·····	445
第四节 佛教化后的本教·····	460
第十章 藏传佛教·····	464
第一节 藏传佛教的特点·····	466
第二节 佛教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476
第十一章 藏族艺术与文史档案·····	491
第一节 藏剧艺术·····	491
第二节 歌舞艺术·····	515
第三节 文史档案·····	519
后 记 ·····	523

绪 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目前已识别和确认的有 56 个民族，其中藏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据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早在 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藏族的先民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从那时候起，藏族及其先民在开发和建设中国西部高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到了 1000 多年前的唐代，藏族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灿烂历史文化的强大民族，史称“吐蕃”。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当时的藏族“东与凉、松、茂、隗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11 世纪的汉族史家王钦若、杨亿也感叹道：“今四夷之最盛强，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①

从此，“原来寂寞无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②这就是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吐蕃国。它比起曾经统治过全部中国的汉族、蒙古族和满族，固然算不了什么，然而它毕竟从此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史称“吐蕃王朝”。

从公元 7 世纪开始，以藏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不但以其兵威震动了高地亚洲，而且其势力也从卫藏地区向外发展，逐步发展到甘、青、川、滇、西域等地，成为当时我国西部地区一个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地方王朝。无论当时藏族统治阶级建立如此强大的地方王朝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三，《外臣部·备御六》。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 2 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490 页。

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客观上,它为西部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促进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7世纪以后,经过1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藏族进一步演化为许多支系,散布于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甚至流入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他们同国内外许多民族发生了交往,尤其是在我国西部,北自甘肃,南到云南的广大土地上,与汉族、羌族、彝族、纳西族、白族、蒙古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相互接触,杂居交融,结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今天当我们探索我国西南、西北各民族的关系和“民族走廊”问题时,处处都涉及藏族。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在我国西部,北自甘肃、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北部存在着一条狭长的民族走廊,称之为“藏彝走廊”。他认为在这条走廊中,存在着许多“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并希望“进一步搞清楚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①他还具体地讲到这走廊中的“疑难问题”有:(1)四川西北部的嘉戎藏语和现代拉萨藏语存在显著区别的问题;(2)康定木雅人在家里还讲一种和藏语不同的土话的问题;(3)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问题;(4)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被称作“西番”的人,在四川境内被称为藏族,在云南境内则被称为普米族的问题;(5)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河就能看到的“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问题等等,都与藏族直接相关。

近几年语言专家孙宏开又进一步提出:在这条民族走廊中,除藏、彝、羌、普米、嘉戎等语言外,确实还存在着“过去还不大为外人所具体了解的‘历史遗留的’语言”,^②即尔苏语(多续语、栗苏语)、纳木义语、史兴语、木雅语(弥药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等。讲这些语言的居民大多居住在藏族聚居区内和藏彝、藏羌、藏汉等杂居的地区。其中操尔龚、扎巴、木雅、史兴等语言的居民,解放后已确定为藏族;操尔苏、贵琼和纳木义等语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孙宏开:《四川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问题》,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言的居民,解放前被称为“西番”,解放后有的说自己是藏族,有的说自己是番族,有的被当成汉族。从这些复杂的语言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这一带民族关系之复杂。虽然近百年来,中外许多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都注意到这一带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著。但迄今为止,这一带的民族关系问题对许多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民族语言的学者来说,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民族走廊的东部是汉、羌、彝、纳西等许多民族的聚居区,西部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区,而且在这个走廊中已经发现的上述历史和语言方面的疑难问题,大都与藏族有关。所以,要搞清楚这个走廊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演变过程,首先必须搞清楚藏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进而才能弄清在这条走廊中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揭开这个当前举世瞩目的民族走廊之谜。

藏族世代居住的“世界屋脊”,一方面地高气寒,而且四周环绕着许多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包括东部的横断山、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西部的昆仑山、北部的祁连山等;但另一方面,它地处亚洲腹地,是长江、黄河、湄公河、萨尔温江、恒河、印度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些江河犹如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走廊,把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文化与藏族的古代文化连接起来,尤其在古代,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自然的河谷进行的时候更是如此。青藏高原的腹地“羌塘”(byang-thang)草原虽为封闭的“内流区”,但它在地理上与我国北方的沙丘草原连成一片,来往无阻,历史上它既是文成公主和唐王朝使臣入藏的路线,又是吐蕃王朝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相互交融和战争的历史舞台。因此,把历史上藏族人民世代居住的青藏高原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完全可以的。但把它看成是一个与周围民族毫无联系的文化孤岛或与世隔绝的文化独立区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仅就现在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汉藏两种文献资料,就可以雄辩地证明,早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到以后漫长的文明历史进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我国北方草原乃至整个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及手工业传统,南

亚次大陆孕育出来的佛教思想意识,均曾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号称世界“最高大高原”的青藏高原上,使藏族的古代文化在本身固有的传统基础上,呈现出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特点。有人说“西藏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①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其范围应该从西藏这个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青藏高原。毫无疑问,东方华夏古文明、南方印度古文明、西方埃及古文明,都曾风一般地吹进了青藏高原。在这里融合成举世瞩目的独特的多重性文化特点,产生出迷人的民族文化合成。因此,藏族的古代文化并非是单一文化,它的民族来源也不是一个血统的单源。从这个角度讲,研究藏族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国际性。

就民族关系而言,古代藏族不仅与国内众多民族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而且与西亚、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民族也发生过联系。弄清楚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对于捍卫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在 1000 多年前曾一度主宰过中亚历史舞台的强大民族为什么一直向心于中华民族并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依据科学的材料,从藏族与周围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中,找出合乎实际的,而且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答案。答案依据的科学材料除了历史文献,还需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多方面的材料,才能使我们的看法避免偏见。

然而,要研究藏族的起源、形成和古代文化历史面临的困难很多:

第一,资料来源方面困难不少,虽然“记录藏族历史的藏、汉文史籍,卷帙浩繁,分门别类,就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而论,在我国各民族中,仅次于汉族,居第二位”。^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马长寿先生曾说过的:“隋唐以前,汉文史籍经常叙述氐羌,但都不曾提到吐蕃。这个道理,现在看来是很明显的。因为古代史家的民族知识总是着重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古时汉族的祖先和吐蕃的祖先既然不曾接触,哪里会了解吐蕃

①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 年第 9 期。

②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前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年。

的历史呢？而且吐蕃王朝是从7世纪开始形成，在此之前，吐蕃系祖先所属的氏族部落共同体也和苏毗、羊同、党项、白兰诸部落共同体一样，僻处一隅，各自为政，不与外界接触，汉族史家如何能够记述它的发展情况呢？由于上述主观和客观的两个原因，所以古代汉族史家无法知道吐蕃族早期发展的历史。”^①因此，当我们追溯隋唐以前藏族的文化 and 民族关系时，在汉文史料中可作依据的可信资料寥寥无几。

隋唐以后，全国逐渐统一，边疆和内地的联系逐步加强，汉族史家对西藏高原的藏族有了初步的了解，史料记载也随之增多。近几年出版的《藏族史料集》、《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等史料大都是隋唐以后的记载。但是，这些史料正如江应樑先生所说：“大多是征伐、招讨、宣谕、封官等类的事，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民族形成、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民族迁徙，以及经济生产、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等，大多缺乏记载。”^②从1978年笔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起，开始接触汉文史籍，1983年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后，在梁钊韬先生的指导下，又重点查阅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羌列传》、《隋书·附国传》、《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南诏传》，以及《三国志》、《北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资治通鉴》、《通典》、《通志》、《唐会要》、《清实录》、《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輿纪要》、《册府元龟》、《马可波罗行纪》、《华阳国志》、《云南志略》、《西藏志》、《卫藏通志》等有关文献。从这些著作中抄录了20多万字的有关资料，但其中涉及我所感兴趣的材料却异常贫乏。写一部藏族的简史，固然可以凭据这些文献资料，但要系统地论述、全面地探索藏族的古代文化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文资料远远不足，于是我又转入查阅藏文文献资料，由于德格县委和德格印经院的大力支持，我得到了不少藏文文献，其中包括《松赞干布宝训》、《五部遗教》、《萨

①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27页。

② 江应樑：《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迦世系》、《德格土司传》等。与此同时阅读了不少解放后出版的藏文历史著作,如《安多政教史》、《青史》、《红史》、《新红史》、《白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智者喜宴》等。这些著作虽然都讲到了藏族历史,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作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佛教方面。在某些著作中,基本上用佛教史代替了西藏的文化史,关于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史料比较少。尤其是隋唐以前关于藏族的来源问题,在这些著作中充满了神话的迷雾,牵强附会之说也屡有所见,其他方面的史料由于受宗教思想影响,往往是真伪相杂,为了扬佛,歪曲史实的情况也是有的。因此,从这类藏文文献中查找史料,犹如沙里淘金。有时从一部 20 多万字的著作中只能爬梳出那么短短的一段甚至一句涉及民族问题的材料。不过,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我从藏文著作中找到了 20 多个历史上与藏族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名称:

Hor:唐指回鹘(纥),元后指蒙古族	rgy:汉族
yu-gur:畏兀尔	sog-po:蒙古族
stag-zig:波斯	mon:缅甸或门
bru-zha:勃律	za-Hor:孟加拉
vjang-yul:南诏	tho-gar:吐火罗
li-yul:于阗	mgo-dkar:回族
kha-che:喀什米尔	yar-kan:叶尔羌
sum-pa:苏毗	zhang-zhung:羊同
gru-gu:突厥	mi-nyag:西夏
vjang:南诏或纳西族	a-zha:吐谷浑
glo-bo:珞巴族	se-rib:悉立

这些族名经常出现在藏文经典中,证明历史上藏族与许多民族发生了接触和联系。但如何接触、交往和联系?可征的文献很少。尤其是要弄清松赞干布以前(7 世纪以前)藏族的历史,还需寄希望于考古发现。

藏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解放后开展起来的。解放前考古工作只限于少数地面文物的调查,而且大部分是由外国人进行的,这些外国人

也并不是专门来进行考古工作,他们当中有些是地理学家,有些是生物学家,有些是传教士,还有探险家。所以,我们只能从他们所写的游记和综合报告中,找到一鳞半爪的考古材料,而且多半没有地层记录。解放后,尤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藏族地区的考古有很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藏区的考古资料,迄今还不够系统,依据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民族学材料进行研究的文章就更少。

第二,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这个专业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事人类文化的研究。为此,笔者从 1985 年 3 月起川西北藏族地区 and 与藏族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调查路线长达几千公里,调查范围在东经 96° — 102° 、北纬 26° — 34° 之间,面积约 30 万平方公里,重点跑了 20 多个县。我之所以把这个地区作为田野考察地区,有以下一些原因:

(1)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成长和工作过的地方,因此,人熟、地熟、语言熟、情况也比较熟悉。

(2) 我的硕士论文和已出版的拙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都是写这个地区内一部分藏族的文化 and 历史发展进程的,而且为此曾进行过六七个月的实地调查,有一定的基础。

(3) 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文化面貌 and 民族成分异常复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史前时期有氐羌、百越、百濮三大原始族群的许多部落在这一带活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最早记载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以什数”来形容民族之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邛都、徙、笮、昆明、冉駹等部落 and 民族。这些被称为“西南夷”或“诸羌”的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不少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隋唐以后,西部的吐蕃、南部的南诏兴起,形成横断山区两个有较高文化的民族共同体,从此这一带的许多大小不等的古代民族 and 部落陆续地被藏族、彝族、汉族等几大民族所融合。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了 1000 多年,原有的许多古代民族 and 部落虽然大多都已消失,但仍有一些夹杂在藏彝、藏汉、藏羌之间,融而未消的民族 or 民族集团保留了下来,通过融合 or 分离又形成了不

少新的民族。因此,直到今天,这一带仍保持着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性特征。迄今为止已识别的民族就有汉、藏、彝、纳西、羌、普米、傈僳、白、独龙、怒、景颇、拉祜等十多个。这些众多的民族,很早以来,互相交往、互相学习、互助、合作、和亲,以致彼此杂居、融合,形成了彼此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更重要的是,藏族与汉、羌、彝、纳西等众多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交流,血缘上互相通婚、融合,持续了 1000 多年的历史。因此,它在我国历代西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我们研究我国西部民族和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地区。藏族古代文化的演变和历史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也可以从这一带看得活、看得深。

第三,笔者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原理出发,综合利用历史文献、民族学、考古学乃至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的资料,探索古代藏族与周围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笔者完全清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文化人类学的原理出发,综合研究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问题,在国内可以说是一种前人未曾做过的一种新尝试,对此,笔者既是兴奋又是胆怯。兴奋的是,我作为一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竟然可以利用几种学科的知识探索本民族的问题,并向全世界说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真正历史发展进程。胆怯的是,我的知识、水平能胜任这个新尝试的课题么?我曾用民族学的方法和材料写出了 10 多万字的硕士论文《从游牧部落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用历史学的材料和方法写出了 20 多万字的专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同时公开发表了 20 多篇有关的论文。但是,这次我面临的是要用几种学科的方法和材料,综合探讨一个拥有 300 多万人口,分布在我国四分之一土地上的民族共同体的来龙去脉,其难度可想而知。

要研究这个课题,既可以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单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探索,也可以用文化人类学这个综合性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探讨。只不过后一种研究方法目前国内还无先例,研究的困难要大一些。不过,要对藏族的起源形成及族际关系得到一个全面、整体的认识,最好

用文化人类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因为民族是一个由共同的地域、经济、语言、心理等要素构成的综合共同体,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一团复合物”(Complex whole),这里所说文化包括经济、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食物、住所、发明、社会组织、娱乐、伦理、语言、心理等很多内容,对这样一个多种文化复合的人们共同体要获得一个全面的认识单靠某一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不但远远不够,而且往往容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各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中可以看出得清楚。

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的过去历史,它的最大特点是能较真实地再现古代历史文化,尤其在古代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研究方面考古学的贡献更突出。在我国各民族文字记载缺乏的情况下,考古学为解决古代各民族的识别问题和研究各民族的古代历史文化关系方面提供了较可信可靠的材料。但是,不少古物经历了千万年的存留和损坏,当我们发现它时,往往是一些残缺不齐、十分凌乱的实物。倘若我们想把这类的“无字地书”读懂,还得进行一番艰辛的考证。这种考证就必须借助于文献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的印证。其次考古学偏重于物质文化的研究,而人类的文化是由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所以要想复原一个民族的完整的古代文化,单靠考古材料是不够的。考古材料可以提供古代各民族群体的结构情况。但这些群体如何结成关系,如何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如何缔结婚姻,如何从事宗教活动等许多具体文化行为的过程,考古的遗址和实物不可能提供具体、生动的例证。这类的活的例证我们只有从民族学和历史文献材料中探寻。正如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夏鼐所说:“关于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单独根据考古资料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面貌,我们主要地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来了解它们。”^①

①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我国文献材料很丰富,素称“文献之邦”。这些材料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从事专门历史文献研究的人也承认,我国古代史学家中存在着“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或“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或“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①等歪曲历史、编造伪史的问题。再加上古代史家中少有像司马迁那样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者。所以自古就有人怀疑文献材料的真实性,甚至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过分说法,以致现代一些史学老前辈也感到“仅依赖文献史料来研究民族史……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少”,^②那么如何补此不足呢?唯一的办法是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

民族学依据保留在现代各民族中的历史文化残余(又称“活化石”)追溯和复原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探索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由于民族学注重实地考察,重视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所以往往容易发现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史料。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形象地称民族学是“山野妙龄女郎”,并认为这是“进行新的探索,得出新的结论的重要途径”。^③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文化残余”毕竟是残余,它在历经千万年的保留过程中必然会有失真,也会有混杂,任何历史文化的残余不可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云南永宁纳西族虽迄今保留着许多原始母系氏族的遗迹,而且其母系亲族堪称早期母系氏族的缩影。但它毕竟与原始母系亲族的真实形态已相去甚远,并且早已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它处在阶级社会免不了带有阶级的烙印。因此,我们利用民族学材料必须注意到与考古学、历史学材料相印证、结合,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理论作用。

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历史文化关系,固然可以利用文献资料、考古

①② 江应樑:《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③ 转引自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

资料和民族学材料,但我们也不可忽略他们的语言。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互相接触和互相影响常常可以从语言的演变中找到证据,有些语言专家说“其可靠性不亚于文物、化石等物质证据”。^① 语言的亲近程度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民族关系。就笔者所调查得知,语言演变同历史上民族间的同化和局部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的迁徙、流动也能引起语言的变化。所以,研究民族历史文化,不可不用语言学的材料和方法。

体质人类学虽然是与文化人类学不同的分支学科。但实践证明,各民族的体质材料和民族间遗传距离的研究材料,对探索民族的种属和民族间远古时代的亲缘关系还是有明显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以来,各门科学已由过去的分解走向现代的综合,许多学科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明显发展趋势。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产生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民族研究要想赶上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出路就在于各学科的结合和开展综合研究。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国内过去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科学,没有公开提倡,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文化人类学正式得到上级的肯定和科学界的公认,原因是时代需要这门学科。笔者从1983年3月到1985年7月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的就是文化人类学专业,由于这门学科在国内刚刚恢复,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所以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人类学是依据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等的方法和材料,研究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规律,正如我的导师梁钊韬先生所说:“研究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称为文化人类学。”^②“这里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学上常用的广义的文化。它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

①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0年。

② 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载《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